

中蘇共擬召開高峯會：決策過程與動機

趙建民

最近有許多跡象表示中蘇共間的關係在冷戰了廿年後，終於即將「正常化」。其實，中蘇共之間關係已經相當正常，中共之所以一再要提醒世人他們間的「不正常」，主要表現於兩邊官方接觸僅止於次長級。邇來雙方最高領導人都分別表達了立即舉行高峯會的熱望。中共和蘇聯佔有歐亞大陸最大的土地與人口，共有土地面積三千二百萬平方公里，佔世界陸地總面積近四分之一，人口合計十三億，佔世界總人口的五分之一，兩者間的任何舉動勢必對於國際現勢的消長有極為深遠的影響。

中共聲稱，有關雙方高峯會的建議是由中共於一九八五年十月首先提出的。為什麼中共突然改變多年來一貫要求蘇聯解決「三大障礙」（即蘇聯軍隊撤出外蒙古和阿富汗，以及壓迫越共軍隊撤出柬埔寨）做為雙方召開高峯會議的先決條件？此一政策轉變的過程又是如何？這些問題恐怕是所有關心世局人士，所共同注視的焦點。

象徵這一波中蘇共關係和緩的第一件大事，是中共「外長」錢其琛於去（一九八八）年

九月廿八日趁參加聯合國第四十三屆大會之便，與蘇聯外長謝瓦那澤舉行了一個半小時的會談，會後雙方同時宣佈錢其琛將於年底訪問莫斯科，謝瓦那澤將於翌年初訪問北平。十二月一日，錢其琛便至蘇聯首都訪問，這是自從一九五六年周恩來訪問莫斯科以來，中共首度恢復「部長」級人員往訪。單從這個事實觀察，便知此次訪問必有重大突破的背景。

鄧小平於去年十月四日在北平會見前西德總理施密特時指出，中蘇共「關係正常化」現已為時不遠，暗示他與戈巴契夫之間的高峯會談正在醞釀。同月十七日，鄧小平對到訪的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齊奧塞斯庫表示，中蘇共間的高峯會議可能於明年舉行。

至於蘇聯方面，戈巴契夫自從於一九八五年上台以後，曾於一九八六年七月廿八日，在海參崴提出與中共舉行高峯會議的建議，其後他又分別於一九八七年十一月（於莫斯科會見尚比亞總統卡恩達），十二月（會見中共「瞭望」週刊記者），以及一九八八年九月（巡視西伯利亞時）做了三次類似聲明。可見雙方會

面意願都相當強烈，隨著類似聲明頻率的增加，會面時機也日漸成熟。

至於促使中共改變心意的最主要原因，是蘇聯在柬埔寨問題上做了讓步。當中共於一九八二年提出所謂的「三大障礙」時，並無差別對待此三條件的意思，但是戈巴契夫在海參崴的演講，除了在邊界問題上對中共讓步，同時表示願意從外蒙古和阿富汗撤軍之外，對迫使越南自東境撤軍一事，堅持其一貫立場認為此為越南內政問題，不便干預。於是，中共便把柬埔寨問題升格為「主要障礙」。

去年八月，雙方代表田增佩與羅高壽（Rogachev）就柬埔寨問題舉行工作會議，蘇聯第一次同意——越南自東撤軍，是解決當前中蘇共問題的癥結。據說中共代表在會中提出蘇聯壓迫越南撤軍問題，蘇方代表答以越南同意年底撤軍五萬，乃是早先羅高壽訪問河內促成的結果。會中並且商定雙方外長在聯合國就柬埔寨問題進一步協調。中共認為，透過這些接觸，雙方都同意早日「公正、合理地」解決柬埔寨問題。錢其琛訪問莫斯科，又增加了政

治解決柬埔寨問題的共同點，有利於高峯會談。

蘇聯對柬埔寨態度的轉變，也導致了中共在越柬衝突中立場的相對軟化。錢其琛在聯大演講時提出五點原則，主張越南撤軍後，柬境四方共同成立臨時政府，編組統一的國防軍，實行國際監督等（中共「外交部」在七月一日已有類似聲明），不再堅持赤棉單獨組織政權。

此外，中共不再堅持越軍必須完全撤離柬埔寨的另一個目的，顯然是想利用莫斯科對河內的影響力，壓迫後者接受其政治解決高棉問題的方案，以便越軍儘速撤離，結束其在中南半島的霸權行爲。

中共對整個國際形勢的評估，尤其是對蘇聯近來在內外政策上所作的調整，都有較前明顯不同的結論。

在國際形勢方面，中共認爲自八十年代中葉以來，隨著美蘇兩強關係的逐漸緩和，雙方在核武裁軍問題上獲致顯著的進展，使得地區性的衝突也漸次通過和平方式達成協議。這種「熱點」正在「降溫」的地區，包括所有亞、非、中東與拉丁美洲。在這種和緩的背後，是意識形態力量的減弱，這一背景當然也適用於中蘇共。

至於所謂的「戰略三角」關係，中共也有新詮釋。三角關係本來只有一角可謂正常（即美國與中共），另外二角都出現或多或少或少的嫌隙。故在美蘇關係增進之際，中共自是不願扮演唯一尷尬的角色。況且，中共的外交傳統有若干大國沙文意識，不願屈居任何權力之下，

這是當初周恩來要倡導亞非聯盟、毛澤東提出「中間地帶」、「三個世界」理論和「自立更生政策」的緣故。這也是鄧小平於和美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後，要亟亟於提出「獨立自主」外交政策的主要原因。單方面關係的進展自然不易維持獨立。事實上，美蘇中程核武協議、阿富汗境內蘇軍的撤離、南部非洲和解等都是美蘇共同努力的結果，中共並未參與，在柬埔寨問題上自然不宜再被排除。

中共對蘇聯的評估可以概分爲安全與內政兩方面。中蘇共由合而分的割裂因素，與其說是意識形態的分道揚鑣，不如說是彼此可能加諸於其安全上的潛在威脅的不安意識。一九七五年南越陷共時，中共即曾警告亞洲國家小心前門拒狼、後門迎虎；七〇年代末期至八〇年代，中共對外政策都以抑制蘇聯「霸權主義」爲第一優先。綜觀其時蘇聯陳軍百萬於中蘇邊界，支持越南進兵柬埔寨，翌年又單獨出兵阿富汗等行動，都增加了中共的不安情緒。

自從戈巴契夫上台以後，蘇聯表現了高度的自制，不再煽動國際紛爭，反而積極、主動的促進國際和平的實現。看在中共眼裏，蘇聯政策有了相當大的幅度改變。

蘇聯在內政方面的改變更令中共吃驚，戈巴契夫上台後立即不遺餘力的推動內外改革，中蘇共之間的距離與感覺立即拉近。最近蘇聯人事不斷重組，戈巴契夫取代元老派的葛羅米柯（Andrei Gromyko）成爲國家主席，改革派如戈某親信葉可夫洛夫（Alexander

Yakovlev）權力地位提昇，以及保守派馬列意識保護神李加可夫（Yegor Ligachev）和格別烏情報首長柴布立科夫（Viktor Chebrikov）貶抑，都象徵蘇聯改革勢力擡頭。中共目前顯然樂於見到此一發展，同時也不希望，此一勢力在蘇共權力競逐上遭受挫敗，影響中共本身的改革計畫，是以願意於此時談判中蘇共關係正常化，助蘇聯一臂之力。

最後，鄧小平的個人問題也相當重要。鄧已日漸年邁，在有生之年完成中共內外環境的正常化心態很強，加上又擔憂繼任者無足夠膽識與戈巴契夫相抗衡，都造成了中共對蘇聯態度的轉變。

本刊歡迎

訂閱、

投稿、

批評、

介紹！